



## 也谈《台湾外记》的演变和著者考

——兼与卢维春同志商榷

李健一

### 一 《台湾外记》的演变问题

郑成功是我国杰出的民族英雄。在《台湾外记》未问世前，关于郑成功的各种传说，早在闽、台、粤三省以及日本等国广泛流传着。江日升于康熙二十三年冬去台湾，亲吊遗墟后，就积极准备撰写《台湾外记》，加上后来受人“谤疑，构讼岁月，徙倚县庭”而更加发奋撰写，并于康熙四十三年完成草稿（见自序年），康熙四十七年完成初稿，最后定稿约在康熙五十七年左右（见彭一楷、陈祈永序年）。可惜原稿本早已失传。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抄本约有四种：一是今人黄永年的“珍藏善本”抄本《台湾外志新编》三十卷；二是大连图书馆收藏的清嘉庆抄本《台湾外志》五十卷一百回；三是收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两种抄本，一为《台湾外志》四部十卷、一为《台湾外志》五十卷一百回。后三种抄本都保留下自序、陈祈永序、彭一楷序、郑应发序、余世谦序、吴存忠序。除了陈祈永序外，其他各序均未见于“求无不获斋”刊印的木活字本、木刻本（包括小字本）。这四种抄本可贵之处：（1）在江美鳌（即江日升父亲）姓氏下，双行夹注：“字龙弼、泉之同安高浦所人。复改文职，任广东连平知州，投诚。”等字。这条注释均不见于“求无不获斋”的各种版本。给后人研究江日升的祖籍和宗族问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2）卷数回数不一，书名略易，内容也有差别。（3）不同程度地保留每卷题下的注年。

(4)更接近原稿本。如黄永年“珍藏善本”的《台湾外记新编》三十卷本，严格按照“是编旁用句点，人名用旁画，地名旁用空画……”江日升载志的“凡例”要求。因此，在原稿本和原刊本不得见的今天，弥足珍重。

迨至“求无不获斋”刻本问世后，光绪四年上海申报馆、光绪三十三年上海均益图书公司、上海进步书局先后刊印了《台湾外记》三种版本。一九五五年台南海东山房、一九六〇年台湾文献会也铅印二种《台湾外记》。至一九八三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陈碧笙教授点校注释《台湾外记》十卷本。从康熙四十三年草稿本演变到今天，已有十几种版本了。木活字本为刻本的祖本，它在九个土音字说中，木刻小字本仅保留八个字，大木刻本全部删去。至于《台湾纪事本末》，谢国祯先生云“……即台湾外纪也。”道光间沈云改编为《台湾郑氏始末》，无论如何，其历史文献价值，远不如《台湾外记》。

从康熙四十三年草稿本到康熙五十七年的定稿本，以至后来的“求无不获斋”各种版本，都发现不断修改的迹象。如“圣祖”的不断出现，陈昂任碣石总兵的时间问题。无不说明《台湾外记》的演变历史。

《台湾外记》之所以“代代传颂，经久不衰”，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人民心中永远怀念着中华民族史上的伟大民族英雄——郑成功。他那短暂的一生，却谱写了与“日月经天，江河恒地”的光辉业绩——抗清驱荷。而就《台湾外记》的史料价值来讲，并不完全象“卢文”所云“正因为记事述人之真实可信……历来从无有人称其妄……”笔者认为：《台湾外记》是一部演义小说，其基本轮廓无太大问题，但其详细内容确有不实之处，有时还与真情事实相去甚远。如广东副都统的名字——“陈昂字英士”一项，笔者通观各种版本的《台湾外记》以及研究《台湾外记》的论著等，均把“陈昂字英士”讹误为“陈昂字星华”。这一讹误直至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碧笙教授点校的《台湾外记》十卷本，才把它改正过来。又如郑芝龙与李魁奇的关系问题。照《台湾外记》记载，郑芝龙大战李魁奇的时间是崇祯二年四月，地点在辽罗海面，大战结果是“龙收其众，令刘魁奇首级，设位祭陈衷纪等……”。而对照《靖海纪略》、《厦门志》等书，不难发现：郑与李交战时间是崇祯三年正月十四日；李魁奇是被斩在泉州城外，当时监斩人是福建巡海道徐日久。这些都与《台湾外记》不符。再如耀“战龙江许耀逃窜”一回的时间、地点和许耀死亡原因等，照对《清史》和《平定三逆方略》等书，同样发现战龙江地点是在“小门、真凤诸山”

(台湾外记误作乌龙江)、“斩许耀及伪总兵伪副将等”(台湾外记误作“耀心急气愤，忽染痢疾，不数日死。”等等)。还有邵武一战等，都与事实相去甚远。略举几点，说明《台湾外记》是作者据口传耳闻加工制作而成的演义小说。因此妄处实有。历次的校勘再版，就是力求减少一些妄的存在。比如台湾文献丛刊本比旧版的《台湾外记》增补八千多字，改正三千多字；一九八三年的福建版本，又比台湾文献丛刊本增补六十四处，四百一十四字，校正了二百零八字。但瑕不掩瑜，《台湾外记》一书，与伟大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名字共垂不朽！

## 二 关于《台湾外记》的成书时间问题

“卢文”云“由此可以推断《台湾外记》成书时间应在康熙二十二年至六十年之间。”这种提法，不仅笼统，而且有误。据王诗琅撰《台湾人物志》载：“日升幼得父口传耳授，台湾明郑事耳熟且详，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浮海过台湾，亲吊遗墟，归撰台湾外记。”《台湾文献》有同样记载。又据大连图书馆清嘉庆抄本江日升自序末署“时康熙四十三年岁次甲申冬至后三日……”一行。这二条资料证明《台湾外记》的成书时间当在康熙二十四年后至康熙四十三年前。另外可据《台湾外记》本身卷端题下：“九闽珠浦东旭氏江日升辑定”一行来补充说明。众所周知，福建简称“闽”，最早曰：“七闽”，明初洪武诏全省八郡又曰“八闽”，后来全省八府也称“八闽”。而康熙二十三年，台湾始设府治，隶福建省，所以福建便有“九闽”之称。至于“十闽”之称，乃是改福宁府后的事。因此，江日升在自己姓氏前冠上“九闽”二字，时代之感再也清楚不过。那么，《台湾外记》的成书时间最早也不会在康熙二十二年。最迟也不会晚过康熙四十八年。因为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彭一楷在余元闻处见到《台湾外记》并作序（见彭一楷序）；康熙四十八年陈祈永在江日升处见到《台湾外记》并作了序（见陈祈永序）。因此说，“卢文”据叶二涯的序来推断《台湾外记》的成书时间是值得商榷的。

## 三 关于《台湾外记》著者江日升的祖籍和宗族问题

“卢文”云：“我认为江日升祖籍应为福建海澄县人。因为《台湾外记》卷端题识为：‘九闽珠浦东旭氏江日升识’。笔者认为，江日升的祖籍应为福建省同安县高浦所人。主要理由有二：一是陈碧笙教授的点校本卷二

